

## 批判的“火”与“冰”\*

## ——由张承志个案论当代作家如何确立批判意识

杨建军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在当代中国消费文化语境中,作家批判意识的弱化值得警惕。本文通过剖析张承志独特而颇具争议的批判意识,从批判者的站位、批判者的视域、批判中的对抗性与自审性、批判的价值追求四个方面论述了当代作家该如何确立富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批判意识。

[关键词]张承志;批判意识;价值追求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6-0075-03

批判性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批判性更是人类反对一切非正义、探寻真理的根本力量。可是,当我们注目中国当下文坛时,便发现一个惨痛的事实:作家创作中批判意识的弱化。批判性弱化已给当代文学结下了恶果,“在‘女作家百分之八十写离婚,男作家百分之八十写‘偷情’的‘新现实’中,‘符号’代替‘思考’,‘欲求’代替了‘需求’,‘身体’代替了‘精神’”。面对如此窘境,我们急需唤醒当代作家富有良知和正义感的批判意识。

要在当下消费文化对批判性弱化、异化、腐化的语境中,呼唤作家批判意识就必须明确批判者该如何站位,批判者应具有怎样的视域,批判中的对抗性与自审

性该如何把握,批判中的价值追求是什么。本文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试图来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选择张承志作为呼唤作家批判性的解剖个案,一方面在于这个作家从民间立场出发的批判意识曾给文坛带来过广泛的争议;另一方面是因为张承志的批判意识是不断发展的,他的发展变化为唤醒当代作家的批判意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

当我们摒弃对张承志“宗教主义者”的静态本质化定义,将《心灵史》前后他的批判立场结合起来进行动态的考量时,就会发现他笔下的批判意识既滋生着偏激的荆棘,又燃烧着可以撷取的火焰。

张承志作品对时代批判意识的彰显,与他深入民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海外回族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XZW0043。

客观事物的夸张描写,以寄托个人思绪,《分甘余话》中不乏此例。如卷4“紫芝白芝”条中就写道:“芝有五色,然紫多吉祥,白多反是。”

《分甘余话》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许多记载不仅为研究清代前期历史特点,特别是研究当时的政治史、社会史和文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而

且可以为今天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所提供借鉴。《分甘余话》当然有它自身的不足之处,但作为保存清代前期史料的笔记佳作,只要我们在征引史料的时候加以选择,就能更好地发挥此书对于正史的补正功能和对现实社会的借鉴作用。

## [注 释]

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页。

谢国桢:《清野史笔记概述》,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0页。

赵尔巽、柯劭忞等:《清史稿》(卷266列传第53),中华书局1977年版。

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序言),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间社会、投入母族文化的过程紧密联系。他跋涉的道路上,同时还变幻着“市场化”、“后殖民化”、“全球化”的大文化气候。为了清晰地把握张承志作品中批判意识的发展脉络,笔者大致将其划分为对中国汉文化孔孟之道的批判、对西方殖民文化的批判、对人类非正义的批判三个阶段。当然,这三个阶段并非严格按时间呈线性排列,其相互间常有交错。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至90年代初期,伴随着一系列回族题材小说的发表,张承志对中国汉文化孔孟之道的批判开始彰显,《心灵史》的问世使这种批判意识达到极致。“孔孟之道化,世俗化,中国化乃是比‘公家’屠刀更凶险的敌手。”“整个中国仅有哲合忍耶才能提示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虽然以孔孟之道(包括孔孟之道同质的佛教与道教)为代表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璀璨的伟大文明,但是对于追求精神充实,绝对正义和心灵自由的一切人,对于一切宗教和理想,对于一切纯洁来说,中国文明核心即孔孟之道是最强大的敌人。”此阶段,张承志激烈地批判汉文化,试图把少数民族的强健血液注入汉文化,这对中国文化在新时期的重建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张承志的批判中燃烧着过于猛烈的对抗性火焰,缺乏自审性的冷静,“他似乎高居天上,用信仰的标准给人世间下了一个判断:‘堕落’。这就是剥夺了现实世界的意义价值和真理,使他不愿意也不可能深入理解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生动的内容”。在此种思维模式的主导下,他的批判难免会走向偏激。

9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中国“市场化”的深入和“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曾经在日本、加拿大漂泊过的张承志深切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危机,他毅然“以笔为旗”,用《无援的思想》等一系列散文展开了对西方殖民文化的激烈批判。他说:“在新殖民主义正在逼近世界时,给殖民者阵营里的反体制派以正义,就是对新殖民主义的抵抗。世间正呱噪着合资合文,友情生财。但是,宿命的我们和他们之间,今天的关系形式,很可能只有战斗。”此阶段张承志所持的批判立场具有积极意义,有学者认为:“对中国来说他已成为了一种新的象征,以其充满矛盾性的存在,突出了中国文化,中华民族,中国知识分子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的困窘与危机;同时也宣布了他为中国而战的意义。”然而,过于激烈的东、西方二元对抗的批判思维模式,扼制了批判者的冷静自审,张承志和当时因民族主义情绪而激动的众多学者一样,陷入了批判的困境。

21世纪初,《谁是胜者》的出版是张承志的批判立

场发展到第三个阶段的重要标志。此书让我们听到了一个中国作家捍卫人类良知和正义的呐喊。当战争的乌云吞没人类正义的天空时,张承志写道:“我觉得窒息。我也没有可供表演的舞台和签证,佯做公正的诗人。我只有绝望,如同那迎着坦克掷出石块的巴勒斯坦少年。”“我想让自己的文章也变成石块,掷向这无义的世界,并拯救自己的良心。”“真正的语言最终是不会泯灭的,它超出了种族和宗教,诉说着人类对公正和大同的梦想。”从这些为正义而激动的文字里我们可以真切感到,张承志站在人类良知、正义的立场上,从开阔的视域里展开了批判。由《幻视的橄榄树》一文我们还可发现,张承志在冷静直面母族的保守之处,“我口干舌燥又十倍热情地,给他们讲全盛的科尔多瓦时代,讲穆斯林那时怎么聪明地分配灌溉水,怎样实施了国家规模的橄榄树种植。可是,从一对对奇怪瞪着我的眼睛里,我明白了:任你说破了天也不管用。对于他们,让他们俯首听言只有一招:请出《古兰经》”。张承志也在此文集中冷静地自我审视:“我不禁为自己和这些自己写下的所谓小说的单薄感到吃惊和害臊;也为容忍和成全了自己的时代感到惊奇与慨叹。”可以说,重新拥有冷静的自审意识再加之一直火热的批判激情和开阔的批判视域合力使张承志的批判意识透显成熟的红晕。当然,张承志文章中未完全泯灭的偏激痕迹还有待于他更冷静的自我审视。

总体来看张承志的批判旅程,其批判的立场是基于民间的。他时刻提醒自己“迈开脚走出去之前,要记着自己底下的厚厚的地层,记着建立和保护自己与生活、与真实、与民众立场之间的这千金难买的关系”。<sup>①</sup>最可贵的是他的批判站位能立足底层、站在边缘。从20世纪80年代独自步入民间,到90年代初皈依宗教,再到“忍着撕裂般的痛疼”告别西海固,继续“自认最好的生存形式——流浪”,再到今天浪迹世界,“追逐伟大的视野”,可以说张承志一直在努力使自己保持流浪者式的边缘化立场。张承志的批判意识中始终燃烧着激愤的烈火,饱含着捍卫人道、自由、正义的血性温热,但缺乏冷静自审的激烈对抗让他陷入了为对抗而对抗的窘境,他在当代也充当了类似堂吉诃德的角色。<sup>②</sup>一旦冷静的自审在批判的“火”与“冰”这对矛盾的张力场中恢复活力时,他的批判意识就重新焕发理性的光辉。张承志批判的价值追求是不断发展的,当初他为“母族代言”,后来他为“中国而战”,现在他为“人类正义呐喊”。但是,关怀弱势群体是他恒定的着眼点。

通过个案分析可以发现,张承志批判意识中的得

失是当代作家确立批判意识的前车之鉴。张承志从一种流浪者式的边缘站位打量世界。事实证明,这有助于他把自己从惯常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冷眼文坛流行风,以笔为旗,执著求索。上升到普遍意义层面,流浪模式不失为作家们可取的一种批判站位,但作家们肯定不能都去流浪。是否流浪无关紧要,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有远离流行、相对独立的思想站位。同理,是否有边缘、民间的姿态也无关紧要,核心还是在于批判者拥有独立的精神态度。“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自称是处于‘边缘’,都是‘民间’。‘中心’,‘精英’,‘知识分子’,‘体制内’一概变成贬义词,惟恐和它们沾边。”<sup>⑬</sup>然而,忙于赶时髦式的站队,只能暴露思想深处的“奴性”。当代作家若想确立真正的批判意识,必须保持独立的思想站位,要勇于高擎自己怀疑的长矛,戳穿一切所谓流行的、神圣的外衣。

张承志因视域狭窄而进退维谷的尴尬让我们明白,作家确立批判意识时必须拥有广阔的视域,除了铭记本民族的苦难外,还要从全人类范围内深思民族个体的处境;要正视“全球化”的大语境,要有为人类的大悲悯。不能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否定外部世界;不能以为掌握一套时髦的创作理论就握住解剖世界的“手术刀”,眼睛只盯着“手术刀”,盲目地对世界一通乱砍;更不能“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八面玲珑”,像一朵妖艳的“文坛交际花”,看上去他的创作对谁都关心,实际上他的骨子里对谁都冷漠。作家的笔端应该饱蘸为苦难深重的人类奋笔而书的热忱。

批判中的对抗性与自审性正如批判中的“火”与“冰”。“火”与“冰”共同锻造了作家成熟的批判意识。批判的“火”中有“冰”,“冰”中有“火”,这对矛盾要始终维持富有张力的动态平衡。批判中的对抗性之“火”显示的是作家敢于向陋俗、非正义抗争的意志与勇气。批判之“火”应燃自作家灵魂深处,这“火”不是为了与光怪陆离的现代文明“霓虹灯”争辉,这“火”只为烛照空洞、

荒诞的当代人性的阴影。批判中的对抗性的表层特征是对现存事物的抗议,深层意义应该是一种建设性。正如罗洛·梅所说:“抗议也具有一定的建设性,因为它从反面坚持了某种类似意志的东西——尽管我并不清楚我赞成什么,但我却知道我反对什么。”<sup>⑭</sup>当代作家对时下人性的腐化坚持批判态度,这是以自己的血性、思想、写作反抗人性的沉沦,目的是为了构建一种健康的人性。批判中的对抗性实质为建设性,不能为对抗而对抗,更不能名为对抗实为“作秀”。

作家批判意识中的自审性,是作家批判意识的淬“火”之“冰”。批判中的自审性应随批判中的对抗性的加强同步加深。自审包含内、外两个方面的意义:向外可对批判对象保持客观、公允的立场,向内可对作家实施自我拯救。尤其对于成名的作家,当出版商、编辑向你一路“绿灯”时,你的“红灯”只能由自己亮起,你要扪心自问,为何成名之后写作能力反而会萎缩?概而言之,作家的批判意识若想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就一定要把握好对抗性与自审性的动态平衡。

现今中国,在商业文化的鼓动下,部分作家正在和底层民众疏离,“农民、普通工人等弱势群体的利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很少有作家作品为他们的生活和利益进行书写,而与商业文化相和谐甚至构成合谋的市民,中产阶级群体,却呈现出畸形的繁荣”。<sup>⑮</sup>张承志的批判意识中可贵的一点就是他始终关注弱势群体。过去一些作家傍着政治的胳膊,把自己扮得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现在为了向经济卖弄风骚,又把自己涂得嘴唇腥红、眼圈黑青。作家们大多缺乏对弱者真诚的关注,缺乏与弱者平等的精神对话。正如萨义德曾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sup>⑯</sup>真正的作家就应该代表弱者、代表穷人、代表没有代表的人申言。

#### [注 释]

张光芒:《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第三次转型”》,《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5期。

李建军编:《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张承志:《心灵史》,海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陈国恩:《张承志的文学和宗教》,《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

张承志:《无援的思想》,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姚新勇:《呈现,批判与重建——“后殖民主义”时代中的张承志》,《郑州大学学报》,1999年版第1期。

⑬张承志:《谁是胜者》,现代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页、第12页、第208页、第274页。

⑭涂险峰:《神圣的姿态与虚无的内核》,《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⑮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00页。

⑯罗洛梅:《爱与意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08页。

⑰贺仲明:《你为谁说话》,《评论》,2003年下卷,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⑱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